

谈谈阶级斗争及 生产力标准

● 蔡仲德 著

ISBN

AXUE

HUBANSHE

同济大学出版社

TAN TAN JIE JI DOU ZHENG JI SHENG CHA

ZHUN

谈谈阶级斗争及 生产力标准

蔡仲德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汇集作者近两年的十篇文章。在其中，作者针对近年来关于“生产力标准”问题的讨论，特别是针对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动乱的实际教训，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斗争、对反“和平演变”、以及对坚持我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批判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观点。在一些有争议的尖锐问题上，作者不回避地表明了独立见解，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

责任编辑 马文瑜

封面设计 陈益平

谈谈阶级斗争及生产力标准

蔡伟德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四平路 1239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市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125 字数: 23 千字

1990 年 11 月第 1 版 199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90 元

ISBN 7-5608 0623-5/D·23

写在前面

奉献给读者的这本小册子，包括十篇文章。

前五篇，原为《同济报》所写，是谈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

《千万不要忘记“思想战”》一文，已发表于今年第一期《思想教育研究》，但经该刊编者删改了。这里收录的是原文。

另外四篇，是对1988年5月14日《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论生产力标准》等文的质疑。其中第三篇曾蒙入选于一个应时的“理论讨论会”。另外三篇，分别寄与有关报刊，企求“争鸣”。结果，只是使我又一次懂得了，决不要相信有些人高声宣扬的什么“百家争鸣”。但其中第二篇最后一部分，承有关编者厚爱，曾在上海《思想理论教育》1989年生产力标准讨论专辑上发表过。

这十篇文章，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一个整体。其中，我力求弄通一个最根本的理论问题：在我们讲社会主义建设，讲社会主义改革，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讲发展生产力时，还要不要讲阶级和阶级斗争？

看过我另一本小册子《中国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的读者会发现，现今这本小册子中阐述的观点，正是那本小册子中的观点的延伸和展开，但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仍然极其有限。审读现今这本小册子的同志，中肯地指出了这个缺陷，并理所当然地要求我扩展

和深化自己的论述。我视此为鞭策，日后当继续努力为之。

“总之，‘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其目的，只是求得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好好研究’和‘继续研究’也。”——本书第五篇中的这个结语，实该为全书的结语。因为，如按写成时间排列，它正是本书最后一篇。

作 者

1990年4月纪念列宁诞辰

120周年之日

目 录

第一篇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动乱的一个教训……………	(1)
第二篇	不讲阶级斗争，谈何马克思主义？ ——再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	(13)
第三篇	“离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是空话” ——三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	(23)
第四篇	“和平演变”在进行 ——四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	(33)
第五篇	最复杂和最困难的问题 ——五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	(45)
第六篇	千万不要忘记“思想战”……………	(67)
第七篇	真理多走了一小步 ——《论生产力标准》等文质疑之一 ……………	(80)
第八篇	不要忽略了主词——社会主义 ——《论生产力标准》等文质疑之二 ……………	(100)

第九篇	何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论生产力标准》等文质疑之三 (117)
第十篇	还要不要讲阶级和阶级斗争？ ——《论生产力标准》等文质疑之四 (134)

第一篇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动乱的一个教训

(一)

在《革命的教训》一文中，列宁说过：“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的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因为当全体人民的生活发生急剧转变时，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什么阶级抱有什么目的，他们拥有多大的力量，他们采用什么手段进行活动。

每一个觉悟的工人、士兵和农民都应当仔细考虑俄国革命的教训”（《列宁选集》第3卷第115页）。

中国刚过去的50天动乱时期，对于我们也正是这样。

它就象一部高度概括的纪录影片，把我们人民共和国40年、特别是最近10年政治斗争的进程、脉络、动力和趋向，在我们眼前显现了一遍。这一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狂风暴雨般的政治大动乱，把当今中国所有的政治力量都“冲洗”了一遍，使人们眼目一新，见到了前所未有的东西。

它似惊雷，使人振聋发聩，从“让世界充满爱”的催眠曲中惊醒过来，从太平盛世的梦幻中猛醒过来。

它似闪电，使人触目惊心，看到了那些用种种伪装掩盖

着的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真面目，看到了中国政治舞台阴暗角落里种种邪恶的阴谋诡计。

它给我们留下了无限丰富、无比深刻的政治教训，足够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咀嚼、消化和记取，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加以仔细考虑。

我以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就是根本教训之一。

遭受过阶级斗争扩大化极左错误摧残的人们，饱受过“文化大革命”十年灾难的善良的人们，也许会大吃一惊：“又来了”！也许会以为这是故作危词，耸人听闻。其实，正如把小孩子和洗澡污水一起泼掉是愚不可及一样，我们否定过去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极左错误，并不能连阶级斗争本身也一起否定。阶级斗争从来是客观存在。它从来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和善良愿望为转移。它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社会和当今世界。它既不因人们无视而不存在，更不因人们否定而不发展。人们之所以感到“又来了”，恰恰是因为人们本不该将它置之脑后，现在它却跑来猛敲人们的脑袋了。

（二）

1957年初，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早就告诫过我们：“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真理历久而弥新。32年之后，中国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又一次用血与火的事实，在

这方面给了我们直接的教训。

1980年1月16日，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邓小平同志指出了我国存在着的一些不安定因素后，特别针对1979年“西单墙”“民主运动”强调指出：“还有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所谓‘民主派’，以及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对这些人也不能低估他们。他们那个旗帜是相当鲜明的。尽管有时也说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实质上是要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这批人，其真实思想就是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大陆不如台湾。当然，他们也并不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台湾的真情实况如何，不少人是误入歧途的，需要教育挽救。但是对这些所谓‘民主派’的总的倾向和真正目的是什么，一定要认识清楚，不要天真。还有破坏社会秩序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和极端个人主义分子等等。这些都是不安定的因素。尽管这几种人的性质不同，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下，他们完全可以纠合在一起，成为一股破坏势力，可以造成不小的动乱和损失。这种情况去年就发生过，今后还可能发生。有人说，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了，怎么还会有阶级斗争？现在我们看到，这两方面都是客观事实。”近十年间，我们不是一直面对着这种客观事实吗？而最近这场大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不又正是说明，如果无视这种客观事实，我们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从已经揭露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这场政治动乱，和1979年魏京生等人策动的“西单墙”“民主运动”是一脉相承的，它正是1979年动乱的直接继续和恶性发展。不仅如此，这场政治动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中，不乏当年“西单墙”的“民主斗士”。他们“东山再起”了。他们“卷土重来”了。

所以，毫不奇怪，在这场政治动乱酝酿期间，今年年

初，方励之等人，就和国内外、海内外某些政治势力相呼应，策动了为魏京生鸣冤叫屈的活动。

所以，决非偶然，这场政治动乱初起时，它的策划者们提出的一个纲领性目标，就是“彻底否定‘清理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为在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

所以，并非意外，在这场政治动乱越演越烈的过程中，它的策划者和组织者，虽然在形势看来对他们不利时，也曾随机应变，乔装打扮，打出过“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和“拥护宪法”等旗号；但他们始终不变的目标就是：“让共产党下台，废除现政权”。正是在他们这样一个基本目标之下，正是在他们这样一面政治旗帜之下，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和社会上各种丑恶势力，一时间，都集结在一起，向我们党，向我们共和国，发动了我们建国以来未曾见过的疯狂进攻。在他们利令智昏，错误估计形势的时候，他们就撕去了一切伪装，公开叫嚣“三天之后成立新政府！”而在他们节节失策，行将覆灭之际，又气急败坏、丧心病狂地使用反革命暴力，发动了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暴乱。一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陷入了极端严重的无政府状态，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处于十分危急的境地。正是在这种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党中央和国务院迫不得已地采取果断措施，宣布并真正实施在北京部分地区戒严，并且动用人民军队的力量一举粉碎了反革命暴乱，从而挽救了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共和国，挽救了中华民族。

这样，这场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就以极大的鲜明性、尖锐性和深刻性，给了我们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实际教育。它通过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形式

——革命暴力与反革命暴力的你死我活的较量，最有说服力地向我们证明了：阶级斗争，不仅还在中国存在，而且，它的核心问题、根本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归根到底，它还得靠“枪杆子”解决问题。“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所以，“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所以，“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最后，“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但首先是活生生的现实，有时是血淋淋的现实。历史和现实，一百遍、一千遍、一万遍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这些最基本的社会真理，而且必将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继续不断地、反反复复地证明这些真理。我们已经为淡忘这些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而受到了惩罚，付出了难以估量的代价。我们总该从此真正学得一点什么了。

（三）

痛定思痛。

在初步总结这场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惨痛教训时，从元帅到农民，从科学家到大学生，不少人不约而同地都首先提到了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样一个根本教训。这一事实本身，就有深远重大的意义。它又一次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群众中的无比感召力。

共和国的元帅聂荣臻在1989年“八一”前夕，给首都戒严部队部分负伤官兵的慰问信中，强调指出：“从这次血的教训中，再次提醒我们，帝国主义的存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

存在，我们阶级斗争的弦就不能松。”

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期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赛福鼎·艾则孜在大会发言中指出：“现在的情况是，阶级斗争的观念淡薄了。”全国人大常委曹龙浩在分组讨论时认为，这次动乱的教训，首先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以来，全党的确忽视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教育工作，从中央到地方带有一个普遍的问题，是不讲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不讲阶级斗争。”

7月17日《人民日报》报道，“七一”前夕，江苏东台市广山乡胡山村党员学习讨论中，中年党员罗金淦说：“我一直在想，这次动乱，教训在哪里？我看啦，这几年国家好像也不提阶级斗争了，思想政治工作放松了，现在是只要抓到钱就是好人，做一百桩好事也没有用。”

《科技日报》1989年6月17日报道了中国科协常委们的学习讨论。报道说：“一些常委坦率地谈到两个多月的思想认识过程，认为明辨是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前一阶段，很多人对一些问题认识不很清楚，只看到学生提出反官倒、反腐败是符合人民心愿的，这种爱国热情应当肯定和支持，听到学生们绝食，也很担心，不赞成他们这样做。但就是没有像邓小平同志那样通观全局，认清事物的本质。这实际上反映了这几年我们脑子里缺少阶级斗争这根弦，思想政治工作观念也淡薄了。”

在首都教育界座谈会上，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贺美英说：“我们花很大力气培养的人，都不赞成社会主义，要搞全盘西化，搞私有制。这是我们在政治思想阵地上步步退让的结果。这种退让表现在不讲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不讲独立自主和艰苦奋斗，全盘否定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淡化和

削弱党的领导、提倡‘精英政治’，把青年人捧上了天等等。”（见1989年7月16日《光明日报》）

《光明日报》同年8月10日报道了上海交大毕业生的思想小结。其中，有这么一段，“事情的发展越来越背离自己的初衷。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局面的呢？原因很多，但关键的一条就是这些年来学校里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阶级斗争观念在我们的头脑中已完全消失，这已经是我们青年学生的通病”。

身在异国他乡的中国留学生魏民，从英国剑桥大学写信给《北京日报》，语重心长地说：“我认为，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现在仍有一小撮妄图推翻党和政府的阶级敌人，西方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也正在侵蚀着我们的一些意志薄弱者。在对外开放搞活的今天，尤其不能放弃阶级斗争观念，更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见1989年7月31日《人民日报》）

从以上种种反映可见，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观念的淡薄乃至消失，不讲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正是造成这场政治大动乱的一个深刻的思想政治根源，也正是使相当多的青年学生和群众卷入到他们始料未及的、并非所愿的政治阴谋中去的一个根本原因，还正是使相当一部分人一时看不清这场政治动乱的实质，在思想上转不过弯来的一个根本原因。

从以上种种反映中还可见，对于不讲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对于我们在思想政治阵地上的步步退让，及其引起的恶果，有些同志早有忧虑，早有疑问，也早有批评，特别是我们老一代的革命家，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但是，问题又一直不得解决，只能落得现在来追悔或说反思。这究竟是怎样

么一回事呢？

(四)

毛病出在党内。

症结是党的前两任总书记的严重错误。

关于新的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关于改革开放条件下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这等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一系列决议中，包括由胡耀邦同志作的党的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都有明确的论述。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特别是以邓小平同志等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总是恳切地反复告诫过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就是我们党的前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和赵紫阳同志，也没有少讲过，有时还讲得很尖锐，很深刻。

远的且不说。在1986年底发生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潮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87年1月16日举行了扩大会议。会议公报说：“胡耀邦同志在会议上检讨了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并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会议对胡耀邦同志进行了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同时也如实地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绩。”会议一致同意接受他的辞职请求，并一致推选赵紫阳同志代理党中央总书记。会议向全党提出了“继续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各项内外政策，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要求。

之后不久，在同年3月25日，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的庄严讲坛上，当时还担任着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同

志，在其向大会提请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宣告：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实质，就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企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由于思想战线领导上软弱涣散，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重视和支持不够，甚至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放任纵容，使这股违反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共同意愿的错误思潮滋长蔓延。这种状况搅乱了部分人的思想，蒙蔽了一些缺乏历史知识和实践经验的青年，影响了安定团结，干扰了建设、改革和开放。去年年底波及若干城市的少数学生闹事，尽管直接引发的原因各地各校有所不同，但从根本上来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结果。听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继续泛滥下去，就会影响更多的人特别是一部分青年迷失方向，就会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动乱的社会，建设和改革统统将无法进行。所以我们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对于这场斗争，我们必须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决不能犹豫和动摇。”

正是：言犹在耳，景物全非。

恰恰是胡耀邦同志的不幸逝世，竟被最近这场政治动乱的策划者视为大好发动时机。而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胡耀邦同志的名字，又竟然成了这伙政治阴谋家的动员旗帜，他们在动乱初期提出的纲领性要求，第一条就是所谓“正确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胡耀邦提出的‘宽松’、‘民主’的主张”！

至于胡耀邦同志的后任者，赵紫阳同志，那就走得更远了。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指出：“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

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更有甚者，“赵紫阳同志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这似乎是难以想像、不可思议的，却是无情的事实。正如列宁当年批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时所说：“在讲过的话可以忘记、原则性可以丧失、世界观可以抛弃、决议和庄严的诺言可以扔到一边的今天，发生这种事情是不足为奇的。”（《列宁全集》第22卷第94页）。赵紫阳同志食言而肥，无视和背弃四项基本原则，长期纵容、鼓励和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李瑞环同志在最近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所指出：“这些年，赵紫阳同志实际上是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态度对待我们党，致使党的整个工作被严重地削弱了。党的宣传工作出现了危机，许多地方队伍散了，阵地丢了，思想乱了。”而拒绝批评、坚持错误的赵紫阳同志，也就不能不落得一个可悲的下场。这是政治斗争的必然逻辑。

由于作为党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同志的严重错误，事情竟发展到了这等地步，在这次政治动乱的严重关头，“如果没有我们党这么多老同志支持，甚至连事件的性质都难以确定。”（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党和政府处于腹背受敌、内外交困、丧失时机、被动招架的危险境地，还有什么可奇怪呢？

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在一段时间内，广大党员、干部